

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尊孔的
反动言论摘录

机会主义路线头子 尊孔的反动言论摘录

中央党校编写小组

**机会主义路线头子
尊孔的反动言论摘录**

中央党校编写小组

*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1印张 11,000字
1975年3月第1版 197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3001·1442 定价0.14元

(内部发行)

出 版 说 明

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他们把孔孟之道作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机会主义路线，必须批判孔孟之道，这是我们党内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机会主义路线的一条重要经验。

为了配合当前批林批孔运动，中央党校编写小组选编了陈独秀、瞿秋白、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彭德怀、刘少奇等几个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尊孔的反动言论，供批判用。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

目 录

陈独秀	1
瞿秋白	6
罗章龙	9
王 明	11
张国焘	13
彭德怀	15
刘少奇	18

陈独秀

“五四”时期，曾以“反孔”面目出现。混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宣扬右倾机会主义，鼓吹孔孟之道，诬蔑工农“幼稚”、“难以加入革命运动”。当农民运动在全国兴起的时候，他又咒骂农民运动“过火”，叫嚷“必须保持一种折衷的中庸的路线”。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堕落成为托派、叛徒，被清除出党。

自社会言之：群众意识，每喜从同；恶德污流，惰力甚大；往往滔天罪恶，视为其群道德之精华。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进化。

《抵抗力》（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独秀文存》卷一

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正不必以此为儒家之罪，更不必讳为原始孔教之所无。愚且以为儒教经汉宋两代之进化，明定纲常之条目，始成一有完全统系之伦理学说。斯乃孔教之特色，中国独有之文明也。若夫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未可自矜特

异，独标一宗者也。

《宪法与孔教》（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一日），《独秀文存》卷一

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盖秦火以还，百家学绝，汉武独尊儒家，厥后支配中国人心而统一之者，惟孔子而已。

《答俞颂华》（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
《独秀文存》卷四

夫孔教之为国粹之一，而影响于数千年来之社会心理及政治者最大，且为当时社会之名产，此均吾人所应绝对承认者。

《四答常乃嘉》（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独秀文存》卷四

记者（按：陈独秀自称）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

《答新青年爱读者》（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独秀文存》卷四

孔子的“均无贫”种种高远理想；……可以证明我们的国民性里面，确实含着许多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的成分。

《实行民治的基础》（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底范围太狭了。……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这种人早已实行了不爱国主义，似不必再进以高论了。

《卑之无甚高论》，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

秦始皇……焚书坑儒压迫言论，便是反革命的了。

《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日)，《向导》第十六期

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略分三类：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这是因为不但多数手工业工人仍然在独立生产者的环境，有许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的环境绝缘，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神权帝王之

迷信，……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九二

三年十二月一日《前锋》第二号

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九二

三年十二月一日《前锋》第二号

虽然我感觉到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按：指土地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可是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也是太革命了的。我们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保持一种折衷的中庸的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四月）

湖南初期的农民运动，缺少党的指导，遂不免有些原始的幼稚行动（所谓幼稚行动在任何国家革命的初期高潮中都不能免）如捕人，罚款，阻禁，企图均分土地，同时举行宗教革命（毁庙毁祖宗牌位）道德革命（妇女解放）等，以引起一般社会之惊恐，土豪劣绅复捏造许多事实在军队中宣传，反对土地改革及根本反对民众运动之右倾分子更从而张皇其词，使湖南出身的军官咸抱不安，对湖南农民运动多少都表示不满，这些都

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湖南政变与讨蒋》，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向导》第一九九期

所有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的人们，倘若不愿孔子成为空无所有的东西，便不应该反对我们对孔子重新评定价值。

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的说有。

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

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

儒是以礼治国的人，礼是君权父权夫权三纲一体的治国之道。而不是礼节仪文之末。不懂得这个，便不懂得孔子。

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

《孔子与中国》，一九三七年十月《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八、十九号合刊

法家的法，即儒家的礼，名虽不同，其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之义则同，……

《孔子与中国》，一九三七年十月《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八、十九号合刊

历代民贼每每轻视儒者。（例如汉朝的高祖和宣帝。）

《孔子与中国》，一九三七年十月《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八、十九号合刊

瞿秋白

青年时代就尊孔读经。混入革命队伍后，坚持“上智下愚”的反动思想，以“文人”、“名士”、“理论家”自居，诬蔑工农是“流氓”、“土匪”，“没有皇帝不能过日子”，把孔孟之道作为他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武器。当他的错误路线受到批判后，又宣扬“仁慈”、“和气”、“忠恕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一九三五年三月，他在福建被国民党逮捕，五月，写了《多余的话》，变节自首，成为可耻的叛徒。

道德上的罪恶，象不爱国，不忠，不孝，不悌，固然完全是根据于第一层意义的，而所谓仁，恕，义，正直，信实，就打破了一切人我家国的范围。凡是违背这些美德的，不论他有利于国家与否，一概都应该认为罪恶。

《社会与罪恶》，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新中国》第二卷第五号

所谓对人的关系，就是“爱”——伟大的绝对的

爱——“爱”，绝对的爱， $\left. \begin{array}{l} \text{对人} \\ \text{对我} \\ \text{对社会} \end{array} \right\}$ 的爱。

这是罪恶功德共同永久的固定标准。

《社会与罪恶》，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新中国》第二卷第五号

当时虽然正是袁世凯做皇帝梦的时候，政治思想绝对不动我的心怀。思想复古，人生观只在于“避世”。

《饿乡纪程》（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瞿秋白文集》第一卷

共产党不但不反对资本家仁爱，而且只有共产党能够使资本家仁爱，——只有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使资本家仁爱。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一九二六年《新青年》第三号

中国革命军队里的农民，大半在没有当兵之前，先经过长期的“土匪学校”。中国无产阶级里的工人，也大半在没有当工人之前，先经过长期的“流氓学校”。中国经济中工业资本发展既迟且缓，多所阻滞，而商业之发展却非常之迅速，农民的破产或失业者，一时不能无产阶级化。这是土匪流氓生活之普遍于中国社会的原因。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九二七年二月）

中国小资产阶级极大部分是农民，我们要特别来说。此地只先说明：农民小资产阶级在当时是认为“没有皇帝不能过日子”的。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九二七年二月）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激烈，其实我是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

《多余的话》（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逸经》第二十七期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多余的话》（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逸经》第二十七期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

《多余的话》（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逸经》第二十七期

罗章龙

一贯崇信孔孟之道。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描写得一团漆黑。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抱着个人野心，在党内另立中央，搞分裂，被开除出党。此后，继续吹捧儒家的所谓“仁政”、伦理道德，宣扬“兼容友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效劳。

吾人知道中国向来的政治思想，……在儒家则崇善政，一切施政出于仁心。

《政治的低能与失德》，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陕西《正报》

中国政治伦理素以仁民爱物为主，而以朋党私利为大戒。西方民主政治虽尚多党竞争，但亦以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为归宿。……中国诸党派则见不及此，他们既视政治为少数私人之职业，故恒勇于私斗以获非常之权利，为着党派私利必然抹煞民族国家的利益！故其行径一切以利用他人为目的，祸国殃民，悉源于此。

《政治的低能与失德》，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陕西《正报》

学术思想界之孔老希腊三哲^①与康德等，在人类史各阶段中，各具有其较胜之性能，故亦可称之为主元，^②其余较次者，则均属辅元之列。

《全元论》，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陕西
《正报》

何谓全德？

一曰持身以诚，诚者物之终始合内外之道也。……

二曰接物以仁，人我合一，宣民胞物与之慈，^③推人及物，极道济万物之爱。故通联人我，兼容友敌，是曰人伦之全，……存己存人，立己立人，利己利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仁之始也。由是更进则通人物而一之，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转，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所谓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者也。故全仁者麻麻有容，视万物同仁（我与自然宇宙合一）人我一体。（我与人类合一）

《全元论》，一九四七年五月九日陕西
《正报》

① “希腊三哲”，罗章龙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② “主元”，意指起“决定性”作用者。

③ “民胞物与”，意即所有的人，不分阶级，都亲如同胞手足一样，并推广到要爱万物。

王 明

叛徒、特务、卖国贼。尊儒反法，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宣扬“先哲”、“天才”一类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自封“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抗战时期，迎合蒋介石，胡说“忠、孝、仁、勇、礼、义、廉、耻”，可以“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叫嚷要使敌对的阶级、党派、军队“相互礼让”、“相互尊重”、“相互敬爱”，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服务。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中华民族中优秀代表的传统光荣；……

《方志敏同志等被俘一周年纪念》，一九三六年一月《民族英雄方志敏》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转载自《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五千年的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真正发扬着，忠、孝、仁、勇、礼、义、廉、耻，由被封建势力曲解了利用了为统治阶级服役的道德，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发扬为真

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

只有把民族命运和民族荣辱放在第一位的民族儿女，才能使原来敌对的阶级，相互礼让，才能使过去敌对的党派，相互尊重，才能使过去敌对的军队，相互敬爱。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

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

我们共产党员不仅承认革命道德的必要，而且努力创造一种新的真正合乎人性的合乎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和生活的道德，……

《在女大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三九年八月八日《新中华报》